

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与新文化运动的互动

——《学术文录》与1917年前后的“整理国故”

张 慎

内容提要 1917年前后编定的《学术文录》讲义推动了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的变迁。“学术文”逐渐从原来的“文章”“讲读”课程中孕育出来，成为北大预科国文课中独立的教学内容。1919年后，受“整理国故”潮流的影响，课程更名为“国故论著集要”，《学术文录》也改名为《中国学术论著集要》。1924年，“国故论著集要”从北大预科的国文课程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国文并驾齐驱的必修课。这也是“国故概要”课程在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中从萌芽、诞生到独立发展的过程。《学术文录》的编撰也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先声。钱玄同的佚文《学术文录上编叙目》梳理并重估了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学术思想，发掘其中的现代内涵，展现了钱玄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重估“国学”传统时的复杂学术资源与现代思想眼光。《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在坊间被一印再印，《叙目》入选高中国文教材，并被指定为高中生国文必读篇目，证明了《学术文录》的广泛影响。

关键词 北大预科国文课程；《学术文录》；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钱玄同

学界对北大预科国文讲义《学术文录》的研究较少，仅陈平原在论著中多有论及^[1]。陈平原在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看到《学术文录》“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觉得其“体例也颇为杂乱”，推测该书“大概是临时写印，日后杂凑而成”^[2]，并认为《学术文录》中“这些‘学术文’的讲习，主要目的不是呈现中国学术演进的线索，而是培养‘学术意识’以及‘文章趣味’”^[3]。他以《学术文录》为例说明“不是所有老北大的‘讲义’都能发展成为‘著作’”^[4]。

更重要的是，陈平原指出，只有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各类‘文学课程’，以及主要由本校教员编纂的‘文学讲义’，还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这三者交叉重叠，互相映照，方能较好地呈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文学教育的立体图景”^[5]。近年来，相关史料的大量涌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学术文录》讲义的编撰与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变迁、新文

化运动和“整理国故”学术思潮的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一方面，《学术文录》的编撰关系着“学术文”课程在国文课程体系中的孕育和诞生，与“国学概要”课程的形成有着重要关系。另一方面，沈尹默、马裕藻、钱玄同等人在1917年前后编选《学术文录》，撰写《学术文录上编叙目》，又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整理国故”，梳理并重估了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特别是钱玄同撰写的长达7800余字的《学术文录上编叙目》，既反映出作为新文化运动“骁将”的钱玄同在整理国故时的复杂学术资源与现代思想眼光，又呈现了新文化运动与北大预科国文教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学术文录》与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的变迁

1913年2月到北大预科执教中国历史、一年

后改教国文的沈尹默^[6]，一直将中国传统学术文献作为国文课程的教授内容，逐渐形成了一个选文目录。1914年9月被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员马裕藻^[7]，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授国文时，也曾教授此类内容^[8]。1914年5月，北大预科“教科整顿”，要求“按照部章所定科目及授课时间”而“编定授课细目”^[9]。此外，1914年7月1日，沈尹默、马裕藻等人被教育总长选派为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负责修身、国文学科审查及编纂事宜^[10]，可能是他们编选《学术文录》的又一原因。1916年10月，沈尹默、马裕藻与在北大预科兼任文字学教师的钱玄同协商，为了系统呈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拟将草目编定为《学术文录》讲义，方便预科、大学国文课程教学之用：

……午后至尹默处，并约幼渔来谈，因拟为大、预选《学术文录》，此事尹默在两年来固已拟就一稿，至今已四、五改，此次所录似最完备，凡分六类，(一)历代学术思想之文，(二)传经之文，(三)关于史学之史(文)，(四)关于政治之文，(五)关于科学之文，(六)关于文学原流之文。其中有《中庸》《礼运》，有《桃花源记》，在思想不发展之人观之，鲜不以为骇怪者矣。^[11]

从1902年到1920年间，北大预科的学科体制曾经过多次调整。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预备科学制三年，“分政艺两科，习政科者，毕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习艺科者，毕业后升入农业、格致、工艺、医术分科”。其课程体系中有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等课程，其中“伦理”为政、艺两科的共同必修课^[12]。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省开办相当于大学预备科的“高等学堂”，学制三年，分为三类：预备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大学者为第一类，预备入格致科、工科、农科大学者为第二类，预备入医科大学者为第三类。其课程体系中的“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是三类学科的共同必修课程^[13]。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又规定各省停办高等学堂，改为由各大学自设预科，学制依旧是三年^[14]。在1914年前后，北京大学预科分为文、法、商三科之预备的第一部和

为理、工两科之预备的第二部，学制三年。“国文”课是一、二部学生的共同必修课。1914年9月开始施行的新课表将第一部学生的国文课由各年级每周三小时增加为每周五小时(第二部仅在二年级每周增加了一小时)，并说明“国文分文章、文字二种，文章每周四小时，文字每周一小时”^[15]。所增加的课时几乎全部分配给了“文章”，可见“文章”的教学内容正在急剧增加。1916年10月，沈尹默、马裕藻、钱玄同编选《学术文录》讲义，对应的便是“文章”课程。

1917年，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学制，预科学制改为二年，分文、理、法三科^[16]。1917年1月21日，正当沈、马、钱三人大致选定了《学术文录》的篇目、参照胡适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标点选文时，三人商讨了预科国文教学的内容和课时问题：

午后访幼渔，与偕至尹默家，商议大学新预科国文标准，计每周九时，拟以二时授文字学，二时授文法及修辞，五时讲读。讲读中以二时授模范文，三时授关于本国学术升降之文。^[17]

可见，在1917年初，国文课将由1914年的“文章”“文字”两种内容调整为“文字学”“文法及修辞”和“讲读”(含模范文与学术文)三种。1918年1月，《学术文录》编撰完成之后，国文课的内容调整为“学术文”“文字学”“模范文”三种，原计划“讲读”中的“学术文”获得了独立的课程地位^[18]。

1919年8月，为了“各种学术之沟通”，北京大学采用选科制，“废去文科、理科、法科之名目，改用分系之办法”^[19]。北大预科也随之取消了文、法、商分科，合并为甲、乙两部。甲部近乎理科，将来入数学、物理、天文、化学等系，乙部近乎人文社会科学，将来入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系。国文课调整为“模范文”“学术文”“文法”三种，是甲乙两部学生的共同必修课^[20]。“学术文”在新课程体系中保留了下来。

《学术文录》交由北京大学排印后，钱玄同等人于1919年9月到10月间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扩充，重新编定目录，拟将其改称《中国学术论著集要》^[21]。在此期间，钱玄同多次将修订、补充

过的选目寄给胡适，征求胡适的意见，并试图推动其公开出版^[22]。1919年末，胡适倡导“整理国故”^[23]，逐渐形成了“整理国故”热潮。受其影响，《学术文录》堂而皇之地更名为《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学术文”课程也被改称为“国故论著集要”，成为了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中主要教学内容之一^[24]。1924年，“国故论著集要”在北大预科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再次上升，从国文课程体系中独立出来，与“国文”并列成为甲、乙两部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程^[25]。

二 《学术文录》与北大预科“国学”课程地位的变迁

实际上，北大预科国文课中的“学术文”恰恰就是后来大学学科体制中“国学概要”“国故概要”一类课程的前身。周予同曾回忆说：

国故概要是研究我国旧有学术的学科。从前北大、北高师曾搜辑关于古今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章若干篇，如《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等，称为“学术文录”，又改称“国故论著”，性质和这学科很相近。^[26]

《中国学术论著集要》于1923年出齐之后，钱玄同也确曾想将其改称为《国故概要》再版^[27]。因此可以说，“学术文”在北大预科国文课程体系中萌生、改名、地位变迁的过程，也是“国故概要”课程萌芽、诞生、独立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重新被纳入民国后的现代大学学科体制之中的历程。

清末的京师大学堂预备科、高等学堂以及民国后的大学预科，都是作为中等学堂毕业生进入大学本科之前的学习阶段而开设的。预科的课程设置往往与大学的专业、学科、课程形成呼应衔接的关系。在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国学”被分解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掌故、词章六门科目，纳入“文学科”之内。相应地，预备科的“政科”则开设了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等课程（“艺科”仅有“伦理”）与之衔接。在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分

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学、工学、商学八科。其单设的“经学科”内含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十一个门类。各门类又有相应的课程体系。整体来看，其课程内容带有强烈的偏重理学、树立正统学术思想的特点。例如在“春秋三传学门”的课程表之中特别强调：

公羊家后世经师之说，多有非常可怪不合圣经本义之论；如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之类，流弊无穷，适为乱臣贼子所借口，关系世教甚巨。近来康梁逆党即是依托后世公羊家谬说，以逞其乱逆之谋，故讲《公羊春秋》者，必须三传兼讲，始免借经术以祸天下之害。^[28]

与之相呼应，《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则为第一、二、三类学生开设了“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等共同必修课。而且，《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对经学的教学范本、思想皆有严苛的规定，要求“人伦道德”要以宋代以来理学诸儒的宗法孔孟的思想言行垂范，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经学大义”要“用钦定八经讲授”，讲授要“正大精核，不流偏倚”，“断不可好新务奇”^[29]。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30]，原来的“经学科”被取消，其部分内容成了文科四门（哲学、文学、历史、地理）之一的哲学门中“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概论”等科目的教学内容^[31]。北京大学则是将“经科归并文科，暂设经学一门”^[32]。从1914年9月北大预科的课程体系来看，此前与“国学”相涉的有伦理、国文两门课，此后则只剩下国文，“国学”课程内容被大量削减。

在1914年到1917年间，颇受章太炎学术思想影响的沈尹默，具有扎实“国学”素养的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编选《学术文录》时，所思考的恰是如何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重新纳入大学预科的现代课程体系中来。从钱玄同1916年10月7日的日记可知，他们准备按照当时习见的学科划分，以学术思想、经学、史学、政治、科学、文学六类来系统整理中国学术思想文献。这种分类，既按照现代学科体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划分出了史学、政治、

科学、文学等内容，又试图兼顾中国传统学术的特殊性，别立“经学”一宗。

当时，学术思想、经学、史学、政治、科学五类文章共选了“百数十篇”^[33]。但只有第一类“学术思想升降变迁之文”的选目，1917年初经钱玄同稍做增删，确定选文77篇。三人参考胡适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对选文施以新式标点，由钱玄同撰写了《学术文录上编叙目》长文，于1917年9月交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计划中“下编”的经学、史学、政治、科学各类选目并未完成。其中，第二类“关于经学大义及传经之历史”的文章，最初所选均为各经“正义”之序。1917年4月讨论时，马裕藻认为不妥，钱玄同认为应该今、古文经学“各有说者两列”，推翻了原来的选目^[34]，最终并没有完成。仅有“文学”一类，因1917年4月预科“讲读”课分为“模范文”与“学术文”两部分，在编选《学术文录》时，也开始编选《模范文选》。后由刘文典作序，于1919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出（此外，预科“模范文”教员程演生也另编有《模范文选》讲义）；后又将《学术文录》中的文论文章独立出来，于1920年前后编成《文论集要》讲义^[35]，成为中国文艺理论上较早冠以“文论”之名的著作。

1919年后，“整理国故”热潮为“国学”课程受到重视提供了契机。1920年10月北京大学在发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计划书》的同时，还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将预科的“文字学”“模范文录”“学术文录”“中国最近世史”等四门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关的课程追认为“国学”课程，并指出“学术文录”可使学生“明中国学术之大概”^[36]。1924年，“国学论著集要”更是从北大预科的国文课程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国文”并驾齐驱的共同必修课。

三 《学术文录》与1917年前后的“整理国故”

整理国故运动在北京大学的兴起，与1913年之后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弟子逐渐取代姚永概、姚永朴、林纾等桐城派文人而成为文科

主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有着直接的关系^[37]。而在胡适揭橥整理国故大旗之前，在北大任教、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章门弟子所从事的国故整理、研究工作，便可谓“整理国故”的先声。而且，钱玄同在去世前梳理“国故研究之新运动”时，一方面将这一“新运动”的开始时间确立为1917年，而非后来研究者所认定的1919年；另一方面，将晚清与“五四”的“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视为整体，认为1884年以来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刘师培、蔡元培、王国维、崔适等12人的学术研究是“第一期”，从1917年开始的相关研究是“第二期”。前者“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后者“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38]。

《学术文录》的选目以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序，选择了评述各时期重要学派、思想家的学术史论、学案等文献，共计77篇。钱玄同在《学术文录上编叙目》（下文简称《叙目》）中用7800余字的篇幅，说明了选文的原因，更系统梳理、论列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学术思想的升降变迁。众所周知，1917年2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致陈独秀的通信，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主张。以此为开端，钱玄同发表了大量倡导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文章，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叙目》是在1917年4月2日到4日间完成初稿，9月12日改定，恰恰完成于钱玄同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因此，从《叙目》入手，辨析钱玄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评判，揭示其评判标准和思想资源，可以进一步认识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的学术思想。

首先，钱玄同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源流、地位、性质的评判，继承了晚清国粹派特别是章太炎的诸多学术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钱玄同继承了晚清国粹派的文化批判精神。晚清国粹派的“复古”主张不仅潜藏着排满革命的政治意识，还以现代民主意识审视中国传统学术，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与晚清国粹派相似，《叙目》也批判了废灭异学、定于一尊、以学媚政、以学媚君等做法，认为李斯“用法家愚民之术以媚暴秦，废灭异学，以吏为师”，导致“六国以来之学术思

潮为之壅滞”；董仲舒“混淆儒法，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导致“百家惧干法纲，噤不敢声”；韩愈“借儒张词，排斥高隐。宋之程颐，益张其说”，导致“国亡种灭，‘攘夷’之义终为‘尊君’之说所败”，学术思想沦为巩固专制统治的工具；纪昀“尊君主、媚异族，进浮华之士，退高隐之人”，导致“无行文人递相祖述”。这五人“实为中国学术思想退化之枢机也”。第二，《叙目》延续了晚清国粹派“以西学发明中学”的学术方法，以西方现代学术观念来评价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晚清国粹派并非顽固的保守派，不仅大都曾热心传播西学，而且常常引西学来研究国学，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39]。在《叙目》中，钱玄同以“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宇宙论”“伦理说”等现代学术观念来认识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和宋代理学；以现代的史学观念来分析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史学宗旨“为发明社会变迁进化之真相，而非徒叙陈迹”。第三，在具体判断上，《叙目》汲取了晚清国粹派特别是章太炎的诸多观点。一方面，钱玄同对东周以前的学术概况及诸子学的诸多判断，大都继承了章太炎《论诸子学》中的观点^[40]。钱玄同认为墨家的“名学尤与印度之‘因明’、欧洲之‘逻辑’相近”，也继承了章太炎将名家之辩论与印度之“因明”、欧洲之三段论相比附的思路^[41]。另一方面，章太炎曾有意从中国学术思想中发掘反叛性的异端。例如，章太炎批评老子学说彷徨于专制与民主之间，终至成为“奸雄利器”；肯定“庄周则于《马蹄》《胠篋》诸论，特发老氏之覆”^[42]；有意表彰刺客游侠为民发愤、义除巨奸的精神，并将其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认为“伯夷所为，今之杜尔斯对也。盗跖所为，今之巴库宁也”^[43]；大力肯定王充“正虚妄，审向背”精神，认为“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44]。钱玄同极为重视章太炎的这些革命性观点，《叙目》同样大力肯定庄子《马蹄》《胠篋》中的自由平等之义、刺客游侠为“公理”和“人道主义”而抗争的精神、王充“实事求是”“破除迷信”的思想。

其次，钱玄同打破“师法”“家法”等门户之见，汲取了廖平、康有为、崔适等人的今文经学观

点，接纳了宋恕、夏曾佑、蔡元培、孙宝瑄等人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判断。1909年读了刘逢禄、龚自珍的经学研究文章后，钱玄同便越出了章太炎“专宗古文，痛诋今文”的思想影响。1911年后，钱玄同在崔适、康有为、廖平的学术著作影响下，“始专宗今文”。1917年后，钱玄同“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为刘歆伪作，则至今仍依康、崔之说”^[45]。《叙目》便采用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说和“三世三统”说，认为“六经”的意义在于“托古改制，借事明义”。而且，《叙目》对汉代以来的今、古文经学传统都有客观介绍，选文既有章太炎批判清代今文经学的《检论·清儒》，又有廖平的《汉艺文志今古学经传师法表》，体现了“今古文各有说者两列”^[46]，客观呈现“今文古文之源流”的科学态度。此外，钱玄同对李斯、董仲舒、韩愈、程颐、纪昀五人的批判，也是由宋恕批判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等四人变乱学术、禁锢异说，导致中国学术思想陷入了“长夜漫漫”的观点调整、补充而来^[47]。在对《列子·杨朱篇》的认识上，钱玄同不同意沈尹默^[48]、胡适^[49]等人主张的《杨朱篇》记录了杨朱一派思想学说的观点，而是汲取了蔡元培的学术判断^[50]，认为《杨朱篇》体现了魏晋时期的人生观、价值观，批评其将“阶级”“厌世”“有命而无可为”等消极思想“集合而为‘苟生之惟我论’”，是学术思想的退化。不过，钱玄同“不同意蔡先生说周朝那个真的杨朱就是庄周”^[51]。

再次，钱玄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评判，及其对晚清学人的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汲取，展现出民主、科学的评判标准、思想立场和学术精神。例如，晚清国粹派常常将法家与现代法治思想相比附，而钱玄同则认同孙宝瑄的看法^[52]，反思了章太炎的观点：“申、商之法，与西人之法治国截然不同。……本师章君常以法家自命，卒不免于刻薄寡恩，此即误认申、商之法为卢、孟之法也。”^[53]《叙目》以现代民主政治理念辨析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的区别：“法家之法，与今世欧美法治国之法迥异。法家之法，保一家一姓之法也。故强迫万民遵守，独元首不受法之支配。法治国之法，保万家万姓之法也。虽元首，亦当受法之支

配。公私异旨，仁暴殊状，不可混为一谈也。”再如，他以现代民主意识评判传统学术思想，有意从中发掘自由、平等、民主、革命、民生等思想传统：庄周《让王》《胠箧》“使人人不失其自由，各事所事，各得所得”；农家许行“创为《并耕》之说，欲举尊卑、贫富、劳逸之不齐者而一归于平等”；墨学“兼爱平等之精神，足以扶植齐民，裁抑君主，不能为专制国家所容”；《史记》“言夷、齐兄弟之让国，及作《采薇》之诗而饿死”，是“借夷、齐之事”明反抗君主专制之义；“项羽升为本纪，陈涉列入世家，尊革命也；刺客、游侠有传，嫉社会之不平也；货殖有传，明生计之切要也”；庄周《盗跖》篇、《吕氏春秋·当物》篇叙述盗跖言行，是“借盗跖以明‘废绝人治’之义”。钱玄同推重刺客游侠，也是因为“当昏乱之世，公理殄灭，人道主义不昌，社会上不平之事，惟侠客能铲除之”。再如，钱玄同一方面以人道主义思想标准，批判程颐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导致“男女平等之真理尽灭”，肯定斥责宋儒“以理杀人”的戴震，是“为饥寒号呼、垂死冀生之男女鸣冤”，并认为戴震与张扬民权、女权的邓牧、黄宗羲、唐甄四人“皆人道之明星也”；另一方面，则有意张扬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李贽等人学术思想中“尊我”“贵己”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钱玄同还从中国学术思想中发掘了构建理想社会、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色彩的“至德之世”“无君”等思想脉络。他认为“老、庄著论，排斥礼乐，废弃仁义，其虚构之理想社会，即所谓‘至德之世’也”；魏晋时期的阮籍、鲍敬言、陶潜倡导“无君”之说，构建了“无礼乐刑政而民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是当时“思想界大放光明者也”；宋代的邓牧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可为三子继起之秀”。

最后，钱玄同在评述传统学术思想时，还呈现出客观、辩证的学术态度。早在1913年，钱玄同就强调“为学本不应有门户”^[54]。《叙目》也肯定了司马迁“学贵闳通，而不当出主入奴，妄立门户”的学术态度。1922年，他更是告诫学生“治学既不可崇拜某人，亦不可蔑视一切，应该用研究的态度，为客观的评判”^[55]。正因此，他能够打

破“师法”“家法”等门户之见，以科学、辩证的学术态度来重估传统学术思想。此外，钱玄同特别重视学术思想的社会意义与实践价值，张扬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叙目》有意肯定宋代叶适、陈亮“愤当时国势之阽危，而理学诸儒徒以道德性命为高，其言美而不切于用，乃昌言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颜元、李塉诸人，痛宋明之亡于外国，则并诋陆王、程朱两派之空谈心性，无裨实用。……专主实习，不尚文辞。较诸叶、陈尤为切实”。

总之，钱玄同的《叙目》以现代民主观念为标准，批判为君主专制张目的学术思想，肯定了宣扬自由平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观念的思想流派；以现代学术视野来评判传统学术思想方法，呈现出客观辩证、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不论其思想立场，还是学术方法，都符合以“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来整理国故的原则。而且，“整理国故”口号提出之后，不论是北大预科的“学术文”课程，还是《学术文录》讲义，都迅速地被追认为“整理国故”的成果。因此，《学术文录》的编撰是“整理国故”的先声。而且，从钱玄同的评判标准和思想资源中，也可看到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与晚清维新派、国粹派之间丰富复杂的思想关联。

四 《学术文录》及《叙目》的版本、传播与影响

《学术文录》讲义“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56]：“目录”中的77篇选文，全然为“学术思想升降变迁之文”；而正文仅有“目录”的部分选文，并杂有“目录”中没有的《文学略》《文赋》《诗教》《典论·论文》《国故论衡·论式》《晋楚邲之战》《晋楚城濮之战》《史通·模拟》《史通·内篇·杂述》《史通·六家》等文学、史学类文章。这是因为其它各类选文并未完成，在实际教学中，只好将钱玄同撰写的《叙目》印在书首，正文则既有《叙目》中的部分选文，又有《叙目》之外的文学、史学类文章。以现在的学术眼光看，钱玄同撰写的《叙目》，既有77篇“学术思想之文”的

选目，又有全面梳理中国学术思想的说明，实际上是以说明文字为“总论”，以77篇选目为文献，构建了一本历时呈现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国学读本。

《学术文录》由北京大学排印后，又经钱玄同等人补充修订，更名为《中国学术论著集要》（以下简称《集要》）印出。1923年7月，钱玄同和单不庵、沈士远商量，准备将其更名为《国故概要》再版^[57]。除《学术文录》外，迄今为止，我们共见到六种民国时期排印的《集要》或《国故概要》印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两种，皆为五册，目录前皆署“中国学术论著集要目录（初稿）”，正文版心上端印有选文题目，下端空白。一种在目录后印有“共文九十四篇”字样；另一种目录后印“以上第五册”“凡文九十三篇，又附二篇”。两种版本都删掉了《学术文录》书首的《叙目》，并在《学术文录》选目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加了李斯、桓谭、仲长统、王弼等古代思想家的传记，及《齐物论》《寓言》《五蠹》《性恶》《解蔽》《天论》等文献；另一方面增选了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近代学人的学术文章。这一类版心下端无字的版本，当系由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而成。第二类正文版心的下端印有出版社信息，共见到两种：第一种共五册，第一册封面印有“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会编”字样，书内版心下端印有“国立成都大学校”“日新工业社代印”字样；另一种版心下印“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成都云雪印字馆代印”字样。可见，《集要》一书的影响已经越出了北京大学的范围，扩散到了四川成都。第三类是《集要》的删选本，共见到两种。第一种封面题署为“梁启超、章太炎编辑”，书名仍为《中国学术论著集要》。但内文第一篇《天下》篇前却署名为《国故概要》，并注明“原名《中国学术论著集要》”。此书选文49篇，书后附有金受申的《公孙龙考》《先秦诸子裂合简表》两文。其49篇选文全部来自北大讲义《中国学术论著集要》；第二种署名“金受申编”，书名《国故概要》，由“北大易社”出版，“中华印书局”印刷发行（版权页未署出版时间）。选文也是49篇，篇目与前一种完全相同。只是把金受申的《公孙龙考》《先秦诸子裂

合简表》印在书前。罗遇唐在该书序中说：

北大国文教授会为教授便利起见，编辑《中国学术论著集要》，上起先秦，下迄晚清，学术论文，蒐罗较备。——近由坊肆印行，更名《中国学术论著辑要》，署名梁启超、章太炎编辑……去年秋金受申先生来就崇实中学国文主任，与余谈拟用此书为崇实中学高中部国文教科副本，惜内容材料较为冗长，乃删节举例之文，重付印行，以其全部纯为学术论文，于是更名《国故概要》。^[58]

可见，第三类《集要》与《国故概要》两书，都是北大《集要》的删选本。这些流传众多的修订本、再版本、翻印本、删选本表明，《集要》一书曾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1925年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和“青年爱读书十部”。念珮、周杰人都将《集要》开列到了“青年必读书十部”中，来自河南的“飞子”则将《集要》列入了“青年爱读书十部”之中^[59]，从中也可窥见《集要》的影响之一斑。多年之后，诸多北大预科毕业生曾忆及“学术文”课程对其造成的影响。例如，分别于1913年、1915年进入预科学习的茅盾^[60]与陶希圣^[61]，都曾详细回忆沈尹默讲授“学术文”的情况。1920年进入预科学习的许孝炎，认为北大预科的“国故概要”课程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回忆了刘文典讲授《国故概要》的情况^[62]。1921年进入乙预科学习的夏德仪，一直收藏着“在北大读书时国文课所用的《中国学术论著集要》”。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依据夏德仪所藏的“北京大学民国十年编辑”的五册本《集要》，重印为精装一册。1913年进入预科学习的毛子水为之撰写了《新印〈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引言》^[63]。1921年前后进入预科的傅振伦回忆说，“‘国学论著要集’课，选读先秦以迄清代关于学术思想等论著，使我明白了历代学术的系统及其变迁”^[64]。1922年进入预科的温公颐曾忆及单不庵主讲《中国学术论著集要》给他带来的影响，并说正是《集要》首篇的《庄子·天下》激发了他学习哲学的兴趣^[65]。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谢兴尧，也多次回忆北大预科的国文课程，认为

“最有益处的，是预科的两门必修课：一是《国学概论》，取材于先秦诸子，铅印线装四厚册；一是《文论集要》，取材于《文心雕龙》《典论》等，铅印线装两厚册。读了这两门课以后，对于古代的学术源流，文章规范，有了初步了解”^[66]。尽管这些回忆可能存在记忆误置的情况，但都表明了“学术文”课程的重要影响。

钱玄同的《叙目》一文，不论是迄今搜集文献较全的《钱玄同文集》，还是其它选集，都没有收录，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现存史料对此文记述不多，仅见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在反驳林纾讥讽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因不能作古文才提倡白话时曾说：“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67]现有文献中未见钱玄同撰著《学术文通论》的记录，从题目推断，蔡元培所说的当是印在《学术文录》篇首，通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叙目》。1919年10月20日，沈兼士致信钱玄同说：“又闻你有讨论国学概要的油印品，可以使我预阅吗？”^[68]大概亦系指油印的《叙目》。

1937年4月，蒋伯潜认为钱玄同的《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序录》“于吾国学术史实已撮取大概”，便将其注释后编入《蒋氏高中新国文》第六册的书末，“取以殿本书”^[69]。经对照发现，蒋氏所选的《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序录》就是《叙目》一文。《蒋氏高中新国文》于1937年4月初版，此后一版再版。到1946年11月，第六册便已出版了五版，可见其影响之大。此外，1942年6月印制的由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编选的《中学国文教材篇目（第一辑）》，将钱玄同的《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序录》列入了供高中生阅读的“论述我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文章篇目中。从这些史料可知，钱玄同的《叙目》曾被选入高中国文教材，并成为高中生的国文必读篇目，在国学教育上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1] 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2005年3期；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陈平原：《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第3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07—30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56] 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2005年3期。

[3] 陈平原：《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第34页。

[4][5] 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6][60][61] 《北大岁月：北大名流与北大精神》，肖卫编，第269页，第17—18页，第295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7][15] 《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报部）》，《教育公报》1915年第9期。

[8][11][17][21][27][33][34][46][53][54][55][57]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第293页，第294页，第304页，第347—356页，第541页，第312页，第313页，第313页，第300页，第260页，第404—405页，第5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 《北京大学预科周年概况报告》，《教育公报》1914年第2册。

[10] 《沈尹默年谱》，酆千明编著，第2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版。

[12][13][14][28][29][30][31]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舒新城编，第546—550页，第561—570页，第640页，第576页，第569—570页，第640页，第64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6][25]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王学珍、郭建荣主编，第64页，第18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文预科第二学期课程表》，《北京大学日刊》第39号，1918年1月6日，第1版。

[19][32] 《国立北京大学略史》，《北京大学日刊》第771号，1920年12月17日，第2版。

[20] 《修正大学预科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425号，1919年8月7日，第3版。

[22] 秦素银：《钱玄同致胡适信、片四十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2期。

[2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24] 《预科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771号，1920年12

月17日,第4版。

- [26]周予同:《新制中学的国文课程》,见《民国国文教学研究文丛·论争卷:1912—1949》,饶杰腾编,第24页,语文出版社2015年版。
- [35]1920年10月,沈兼士在《〈文论集要〉叙》中说,“《文论集要》是本校国文教授会选集的古来讲究作文技巧拙利病的文章。原选本来把这一部分包括在学术文里边”。沈兼士:《〈文论集要〉叙》,《北京大学日刊》第714号,1920年10月12日,第4版。
- [36]《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期,1920年10月19日,第3版。
- [37]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2—1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38][45][5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319—320页,第225页,第2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39]如刘师培的《国学发微》便以现代的哲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来重新认识“六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西人社会之学”“考中国造字之原”。晚清国粹派还明确倡导“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哲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见《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卷第1期,1907年3月。
- [4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章念驰编订,第48—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 [4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王培军、马勇整理,第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42][43][4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诂书〉初刻本、〈诂书〉重订本、检论》,朱维铮点校,第134页,第448页,第452—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47]宋恕:《致夏穗卿书》,《宋恕集》(上),胡珠生编,第526—527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 [48]茅盾回忆沈尹默在北大预科讲授国文时的情形时说,沈尹默认为“《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见《北大岁月:北大名流与北大精神》,第17—18页。
- [49]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欧阳哲生编,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50]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74—78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52]孙舆(孙宝瑄):《搢画斋统一分治刍议》,《宪法公言》1916年第3期。
- [58]罗遇唐:《〈国故概要〉罗序》,见《国故概要》,金受申编,第1—2页,北大易社,出版时间未详。
- [59]《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王世家编,第50页、第86页、第15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62]周策纵等:《五四与中国》,第680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
- [63]毛子水:《新印〈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引言》,见《中国学术论著集要》,第1页,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
- [64]傅振伦:《广博与专精》,见《北大学者谈读书》,肖东发、杨承运编,第12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 [65]温公颐:《温公颐自传》,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晋阳学刊》编辑部编,第447—44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66]谢兴尧:《学史漫谈》,《堪隐斋杂著》,第5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67]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165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 [68]《疑古玄同:钱玄同文物图录》,北京鲁迅博物馆、湖州市博物馆编,第64页,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
- [69]蒋伯潜:《蒋氏高中新国文》第6册,第419页,世界书局1946年版。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